



VOLUME I 第1冊

伊斯蘭文明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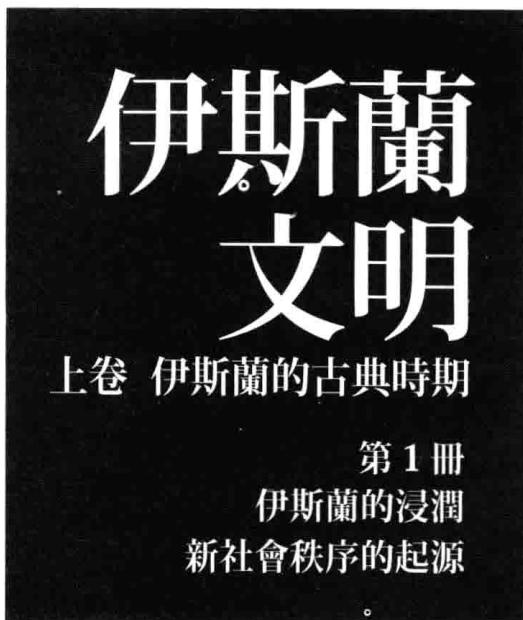
上卷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長寬 審訂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THE ISLAMIC INFUSION: GENESIS OF A NEW SOCIAL ORDER

歷史,

世界史

伊斯蘭文明史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上卷第一冊

作者	馬歇爾·哈濟生 (Marshall G. S. Hodgson)
譯者	張人弘
發行人	王春申
編輯指導	林明昌
營業部兼任 編輯部經理	高 珊
主編	王窈姿
責任編輯	黃楷君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	廖祈輝
印務	陳基榮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3號8樓
電話	(02) 8667-3712 傳真：(02) 8667-3709
讀者服務專線	0800056196
郵撥	0000165-1
E-mail	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	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	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5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1500元（套書上下冊不分售）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UME 1: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ISBN 978-957-05-3015-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只視教友為人，且斷定唯有單一民族能享有恩惠而排他者，這其中思想的盲點顯而易見。

——約翰·吳勒曼（John Woolman）

* 譯註：約翰·吳勒曼（John Woolman, 1720 – 1772 CE），美國貴格教會（Quaker）佈道家，也是南北戰爭前主張廢除黑奴的知名人士。

導讀

何謂伊斯蘭文明史？

林長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通常 Islâm（音譯「伊斯蘭」）一詞在華文世界大多翻譯成「回教」或「伊斯蘭教」，然而事實上，經過十四個世紀的發展與演變，已經不該以單純的「宗教」名詞看待 Islâm 一詞，而是廣義界定「伊斯蘭為一個文明體系或是文化概念。相對而言，伊斯蘭歷史（History of Islâm 一詞）亦可界定為一個信仰群體——即穆斯林——所建構之社會、文明體系的歷史，所以它已經不單是信仰本身的發展歷史。Islâm 一詞的中文翻譯（或音譯）可以非常模糊，但在英文裡則不然。就西方學術研究的發展過程分析之，Islâm 一詞本身作為名詞，但其衍生詞包括形容詞如 Islamic 或 Islamicate，或是名詞如 Islamdom。如同 Christiandom（基督教世界）一詞，Islamdom 被翻譯或解讀為 Islamic World（伊斯蘭世界）；Islamic 與 Islamicate 兩者的區分在於形容範圍的大小，Islamic 形容的範圍較為狹窄，主要與伊斯蘭宗教相關，但這種用法常常有不切實際的誤解，所以才創造「Islamicate」¹一詞，指稱「凡是關於 Islâm 這個宗教為基礎而建構出來的一切，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事務，以及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社群其內在、外

1 Islamicate 一詞率先由哈濟生（Marshall G. S. Hadgson）創用。

在、形而上、行而下等所有可能涵蓋的內容」。Islamicate一詞在學術上的用法比Islamic嚴謹，兩者在英文裡的區別，倘若翻譯成中文，就無法清楚呈現兩者之間的差異，只能以「伊斯蘭的」此一詞語來共同表達「Islamic」、「Islamicate」；或許Islamicate亦可轉譯為「伊斯蘭化的」，也就是所有關於「因為伊斯蘭的注入而引起變化的文明與文化內涵」。

傳統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西方的伊斯蘭歷史研究無法脫離以歐洲為中心（Europe-centric）的世界史框架，特別在建構「文明的歷史」上。1974年，哈濟生（Marshall Goodwin Simms Hadgson, April 11, 1922 – June 10, 1968）的三卷巨著《伊斯蘭文明：世界文明裡的良知與歷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²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完整出版，此套巨著出版後對西方伊斯蘭史研究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從書名的標題用詞即可得知，作者試圖從世界文明體系去看待伊斯蘭文明的發展與內涵，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這項研究可謂創舉。事實上，哈濟生撰寫此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把經過十四個世紀孕釀而建構出來的伊斯蘭文明視為「人類整體文明」的一部分，即「as part of the un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然後進行深入探討。哈濟生在人類文明整體論的概念上，顯示了他本身對於宗教信仰的認知，即所有人類皆屬於同一個創造來源；所以，上帝創造人類後，人類自己建構出來的文明應該具有一統性（unity）。部分研究指出，哈濟生的人類（或伊斯蘭）文明史概念，與他的宗教信

2 就英文書名觀之，哈濟生的寫作目的相當清楚：對一個世界性的文明做具有良知的歷史建構，亦即對整個伊斯蘭（文明與文化）的歷史發展，實行客觀性的解讀。

仰、學術養成的背景有莫大關係，而且他的理論不會因循傳統西方「東方學者」(Orientalist) 的偏頗態度。

哈濟生這部 *The Venture of Islam* 的書名很難翻譯成中文，可直接翻譯成「伊斯蘭進程」或意譯為「伊斯蘭文明發展」。這部書的撰寫構想可以說源自於他在芝加哥大學開設的「世界文明」課程，這個課程除了教授西方文明，亦教導印度、中國以及伊斯蘭文明。當時課程的設計概念是基於 Robert Redfield 與 Milton Singer 的「文明觀」。哈濟生研究的伊斯蘭歷史除了受到啟蒙導師 Gustave von Grunbaum (1909 – 1972 CE)³ 的影響外，也呼應了當時歐美伊斯蘭研究學者 (Islamicist)，例如 Muhsin Mahdi (1026 – 2007 CE)⁴、Wilfred Madelung

³ Von Grunbaum 為奧地利籍東方學者（專精於伊斯蘭歷史與阿拉伯文化），他為了逃避納粹迫害，1938 年遷徙至美國，1957 年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教授，並創立「近東研究中心」，培養不少美國當代中東與伊斯蘭的研究人才。他所撰寫的三冊伊斯蘭文化史為其代表著作：*Classical Islam: a history, 600 – 1258*（古典伊斯蘭：600 年～1258 年的歷史）、*Medieval Islam: 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中世紀伊斯蘭：文化走向之研究）、*Modern Islam: the search for cultural identity*（現代伊斯蘭：文化認同的探求）。他曾經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近東歷史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長達六年之久 (1943 – 1949 CE)，哈濟生當時為他的學生。他對伊斯蘭歷史的分期與理論可以從哈濟生的 *The Venture of Islam* 得到印證。

⁴ Muhsin Mahdi 為伊拉克裔的美國伊斯蘭學者，1948 年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受教於 Nabia Abbott (1897 – 1981 CE) 與 Leo Strauss (1899 – 1973 CE)，並於 1954 年取得博士學位，Muhsin Mahdi 的博士論文研究中世紀伊斯蘭社會史學家伊本·哈勒敦 (Ibn Khaldun, 1332 – 1406 CE) 的伊斯蘭文明史觀與政治哲學。畢業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近東語言與文明系」(1958 – 69 CE)，後來轉至哈佛大

(1930—)⁵、Lloyd Fallers (1925–1974 CE) 等人的觀點；而哈濟生的文明史觀亦可說是延續並修正了 William McNeill (1917—) 關於人類文明的理論。McNeill 的經典著作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⁶ 對哈濟生的伊斯蘭文明架構與理論有著深刻的指標作用。此外，十八世紀歐美思想家 John Woolman (1720–1772 CE) 的理念與二十世紀伊斯蘭學者 Louis Massignon (1883–1962 CE)⁷的研究理念與情懷，亦被

學 (1969–1996 CE) 任「中東研究中心」主任，以及「近東語言與文明系」主任，教授伊斯蘭文明與阿拉伯語言文化，他對「天方夜譚」的研究成果已被公認為此領域之經典。

- 5 Wilfred Madelung 為德裔美國籍伊斯蘭學者，1947 年隨家人移居至美國，就讀於 Georgetown University，後回德國漢堡大學修習博士學位，受教於著名的伊朗中亞伊斯蘭研究學者 Berthold Spuler。他先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牛津大學 (1978–1998 CE)，退休後轉至倫敦的 Institute for Ismaili Studies 從事研究工作。其著作以伊斯蘭早期歷史為主，為伊斯蘭教派與什葉伊斯蘭研究的權威。
- 6 臺灣中文翻譯本見：郭方等譯，《西方的興起》(台北市：五南出版社，民國 79 年)。中國簡體字版：孫岳、陳志堅、于展等譯，《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7 Louis Massignon 早年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經驗，讓他對伊斯蘭有了不同的認知。他的伊斯蘭研究著重於蘇非主義 (Sufism)，特別是關於「神智學」(Ma‘rifah) 的探討。他對蘇非行者 al-Hallâj 的研究已經成為蘇非研究中的經典。由於他對伊斯蘭研究採取同理心的態度，所以他的研究成就再加上後來改宗為天主教徒的身份，使得他一生致力於提倡亞伯拉罕諸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之間的對話。他對伊斯蘭的態度也深刻影響了第二次梵諦岡宣言：Vatican II declaration Nostra Aetate 的提出。

哈濟生汲取並且融入於寫作中。John Woolman 與哈濟生同為貴格教會成員，Woolman 反對歐洲殖民勢力奴役東方的情懷明顯地反映在哈濟生的著作中，哈濟生在書中駁斥了所謂的「白人優越」的成見，指出此一成見對於伊斯蘭的偏頗觀念與歧視。Massignon 亦為基督宗教徒（Massignon 為法國天主教徒），他對伊斯蘭的關懷所產生的同理心研究態度也影響了哈濟生，換言之，兩者皆試著從伊斯蘭內部去理解其內涵與文明本質，亦即從「類insider」的立場看待伊斯蘭文明的發展。簡而言之，哈濟生這部 *The Venture of Islam* 試圖排除過去的歷史成見，重新建構伊斯蘭歷史，並且以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去呈現穆斯林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重新解讀伊斯蘭文明與文化，釐清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誤導的伊斯蘭歷史。

哈濟生本身為一神信仰者，由於信仰的緣故，所以關於經典（如《聖經》、《古蘭經》）中神啟示、教誨信仰的現象，常常在他的著作裡表露無遺。由於穆斯林社群在生活、宗教信仰方面的虔誠表現，以及伊斯蘭思想體系的建構，都深受《古蘭經》的影響，因此哈濟生的論述常可見到主要穆斯林思想家和宗教學者理解、處理伊斯蘭的態度。⁸ 對哈濟生而言，這些人是真正伊斯蘭歷史、文化的建構者，而不是那些朝代、帝國的創立者。他的創新態度突破過去伊斯蘭朝代史編撰的傳統框架；藉由他的詮釋途徑，更加容易將讀者導入伊斯蘭情境中，而去除自我的既定成見，特別是對於非穆斯林的讀者而言。

哈濟生以世界史的角度看待伊斯蘭歷史，乃是一種必然且超然的

8 哈濟生本身對於那些穆斯林思想家、經學家如 Abâ Hâmid al-Ghazâlî、Imâm Abû al-Hanîfah、Ibn al-Hanbal、Muhammad 'Abduh 等人，相當認同與讚賞。

態度與認知。事實上，在十到十三世紀之間，世界文明除了東方的中國之外，可以說是以「伊斯蘭中土」(Central Lands of Islām) 為中心，更何況整個伊斯蘭文明的範圍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顯然，哈濟生對伊斯蘭歷史的研究奠基於他對世界文明的探討，而他的最大成就在於「改變了傳統西方『東方學者』的研究途徑」，他深知西方學術界無法再炮製帝國殖民主義者「自我優越」的觀念，或是延續其遺緒，新時代的學者必須以多元角度去看待他者之歷史文明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哈濟生處理的伊斯蘭文明史，使讀者（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皆然）能清楚理解伊斯蘭文明的正當發展，以及它與其周遭文明的相關性。就當代對於文明衝突的態度和尋求解決的方針而言，哈濟生無疑提供了「和平對話」的契機。

The Venture of Islam 這本書顯示了哈濟生對西方傳統「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的檢討批判。歐洲傳統的「東方學者」在解讀他文明（或文化）時，往往無法就文本本身去作更廣度的詮釋，也就是說，這些學者無法就文本進行演繹，反而侷限在文本的字義上，對早期以語源學 (philology) 為基礎的伊斯蘭文明研究而言，哈濟生研究的改變是一項重大突破。在這方面，哈濟生更意圖突破單一語言的障礙，他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要素，例如解釋穆斯林語言中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烏爾都文 (Urdu) 作為宗教文化載體時，它們之間的關係。哈濟生相當反對「單一語源」的研究途徑，而且，他也反對傳統「東方學者」將歷史放在單一特殊的情境中去解說。他體認到隨著信仰的流動，文明的元素也漸趨向於多元性，從單一特殊情境的根源擴大出去。此一態度也顯示哈濟生突破了傳統東方史學家「學術為政治服務」的困境；因此，他也批判了基督宗教徒或西方宗教學者，

指出這些學者以自我宗教文化傳統去看待其他文化的偏頗立場。

哈濟生的世界史觀雖然受到芝加哥大學世界史教授 William McNeill 的影響，但他也提出 McNeill 史觀的問題，即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觀是不恰當的。客觀的學者不應該以單一地區為中心去建構世界史，而是必須以不同地區的交互關係作為基礎，進行探討。哈濟生把人類全體視為建構世界歷史的前提，他主張人類文明的發展是跨界的，也就是說，文明的成形存在著流動性，即使檢視蒙古帝國的形成，也不能以地區文明來看待之。由於哈濟生貴格教會的背景，使得他認知全人類皆應為弟兄，進而主張伊斯蘭文明亦非單由穆斯林所建構而成，而是基於不同宗教文明的交互連結所形成。換言之，伊斯蘭文明是立基於它之前的文明。

哈濟生將人類文明的歷史分為四期：（一）西元前 800 年以前的早期文明，（二）西元前 800 年至西元前 200 年的軸心時期（Axial Age），（三）西元前 200 年至西元 1800 年的後軸心期，（四）西元 1800 年以後的現代時期。伊斯蘭文明出現的時期屬於後軸心期，其活動範圍主要介於尼羅河（Nile）與烏茲河（Oxus）之間的區域，此一地區可稱之為「伊斯蘭中土」。從這四個分期階段來看，伊斯蘭文明的成形並非偶然，在伊斯蘭之前，該地區就存在了高度文明；換言之，哈濟生主張伊斯蘭文明乃跨越不同地區的文明，然後逐步整合累積而成，而且伊斯蘭的發展是由人類幾個宗教文化整合轉化而成，這種理論可謂對抗以歐洲基督教為主宰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也說明了伊斯蘭興起造成大轉化（transmutation）的文明，也刺激了現代西方文化的大轉化，其中最重要的轉化因素是「工業技術化」（technicalization），這種 technicalism 的理論與觀點乃是世界文明形成

的基礎論點，不僅伊斯蘭文明如此，西方現代文明也印證此一因素的關鍵性。

透過 *The Venture of Islam* 一書的著作，哈濟生提出了新的文明研究途徑。他認為文化與文明會不斷的流動，而非靜止不動，它具有動力，而文明更是在不同文化間相互交織而成形。因此，他主張伊斯蘭文明是由之前波斯伊朗—閃族（Irano-Semitic）的傳統不斷累積而形成。哈濟生主張伊斯蘭文明實為落實伊斯蘭宗教理念的成果，它也承繼了之前的宗教文化要素。伊斯蘭理念當然以《古蘭經》中神啟（Wahy）的訊息與教義為依據，世代以來，穆斯林即用《古蘭經》的訊息作為對話的內涵，醞釀出新的伊斯蘭文明理念，而對話的結果也形成所謂的「順尼伊斯蘭」（Sunnism）與「什葉伊斯蘭」（Shī‘ism）。⁹ 哈濟生稱這些對話者（‘Ulamā’〔宗教學者〕）為「以前信為依歸者」（piety-minded）或「強調伊斯蘭法者」（Sharī‘ah-minded）¹⁰，他們是伊斯蘭文明體系的中心成員，他們之間不僅相互對話，亦與其他信仰者如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等交流。¹¹ 經過不同民

9 一般稱之為「遜尼派」或「什葉派」，而所謂的「教派」實際上是早期穆斯林社群政治利益衝突下的分裂結果，在此以「順尼伊斯蘭」、「什葉伊斯蘭」稱之，較貼近於伊斯蘭文明」的內涵。

* 10 編註：內文為求文意順暢，分別譯為「虔誠主義者」與「伊斯蘭法主義者」。

11 根據一個明顯的例子，《古蘭經》並沒有提到亞當配偶的名字「夏娃」，但穆斯林經學家皆在著作中使用「夏娃」這個名字。而且中世紀穆斯林思想家或神學家都相當熟悉《聖經》新舊約中的人物故事，這顯示穆斯林與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之間的對話早已存在。

族的穆斯林之間，或與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對話、互動之後，伊斯蘭的內涵顯得更豐富、多元且複雜，為了精確描述這種情形，哈濟生創造了一個詞彙，即「*Islamicate*」。他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對話過程持續地與伊斯蘭最初形成期的思想理論保持連結關係，也造成了伊斯蘭文明的一慣性（或曰統一性〔unity〕），此即穆斯林之間共同的意識，也是伊斯蘭持續發展之基礎。由於伊斯蘭世界幅員廣大，哈濟生也不否認在單一性的大前提下還有地區性的差異，也就是地區性的「次對話」（sub-dialogue）性質，他用此一理論推翻傳統所謂的「順尼正統性」（Sunni orthodoxy），說明「什葉伊斯蘭」與「順尼伊斯蘭」之間實質平行共存的發展。更有意義的是，這種對話所形成的文明否定了「阿拉伯」即為「伊斯蘭」的錯誤觀念。然而，至今尚有不少人將「伊斯蘭文明」與「阿拉伯文明」劃上等號，嚴格地說，阿拉伯人充其量可謂伊斯蘭文明發展的帶動者。就整個伊斯蘭文明發展過程而言，其他民族如猶太人、波斯人、突厥人、柏柏人等，皆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就歷史發展而言，哈濟生主張伊斯蘭文明的歷史可區分為三種不同階段：（一）形成期、（二）中世紀時期，以及（三）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與現代時期。他劃分此三段時期，分別在其著作中的三卷六冊論述之。在形成期階段（約西元600年～945年），古典的敘利亞文（Syriac）與巴勒維文（Pahlavi）為載體的文明與宗教文化，被由阿拉伯文（Arabic）為載體的伊斯蘭所取代。這段時期屬於不成熟時期，並未建立臻至定居型態的帝國。西元905年至1503年間的中世紀時期，其特色是形成、發展了國際化的社會，新波斯語文

(new Persian)¹²取代了阿拉伯語文，並且成為上層文化之宗教、知識分子思想的載體。哈濟生把這段時期視之為伊斯蘭文明的黃金光榮期，也是文化的成熟期，伊斯蘭世界處處呈現大都會性質的社會結構，也表現出伊斯蘭文化與文明的多元性。伊斯蘭文明史的第三期顯現伊斯蘭中土的政治大分裂與勢力大重整，由歐斯曼（the Ottomans, 1299–1923 CE）、薩法維（the Safavids, 1501–1736 CE）與蒙兀兒（the Mughals, 1526–1857 CE）三大帝國控制、統治。¹³一般學者認為從這個時期起，伊斯蘭文明逐漸步入衰微期，但並不意謂伊斯蘭文化衰退不振或文明結構瓦解了。這個時期也是伊斯蘭教派正式分裂，教義、律法各自主張表述的時期，也就是說，順尼派與什葉派正式宣告各自具有正統性，政體獨立且彼此之間不附屬；然而，順尼派穆斯林所控制的區域遠大於什葉派穆斯林的分佈區，只有薩法維帝國境內的什葉穆斯林佔主要多數，什葉穆斯林在其他地區則為絕對少數，這

12 所謂的「新波斯語文」乃指「阿拉伯化」、「伊斯蘭化」後有別於舊巴勒維語文的伊朗語文。新波斯語文採用阿拉伯文字母，並在表達宗教文化時，吸納了阿拉伯文的伊斯蘭詞彙。

13 此三大國的伊斯蘭文明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歐斯曼帝國強調自己為順尼伊斯蘭的捍衛者，並強化了宗教學者的體制，宗教學者被納入官僚體制內，必須服務統治者蘇丹。薩法維帝國自稱為什葉伊斯蘭之法統者，但其體制更傾向於古波斯傳統，不過在什葉伊斯蘭的傳統中，宗教學者則成為統治者的監督者。至於蒙兀兒帝國則採取在地化途徑，試圖與被統治的多數印度教徒妥協，並融合其文明，其間雖有宗教改革的聲音出現，但仍然無法避免在地化的進行，因為穆斯林雖然是統治者，但相較之下是少數群體。

也是順尼派被大多數人誤解為伊斯蘭主流的原因之一。¹⁴而且也由於此時間歐洲發展了科技，導致帝國殖民主義興起，再加上伊斯蘭文明衰靡不振，伊斯蘭世界遂淪為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從而產生諸多問題，至今，西方或穆斯林國家的主政者皆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伊斯蘭文明奠基於宗教的發展與遺緒，哈濟生的這部巨著也以此區分成六冊，說明伊斯蘭文明的發展層面：創造時期（至西元672年）、哈里發帝國時期（至西元945年）、國際化的伊斯蘭文明（至西元1258年）、蒙古主宰時期（至西元1503年）、火藥帝國時期（至西元1800年左右）以及現代時期（十九世紀初以降）。此六個時期皆有各自獨特的社會與文化因素。哈濟生對伊斯蘭文明史的分期方式不同於一般的朝代史，他主張文明的發展不應從朝代建立的順序來觀察，而應該以文明本身的進化來看。事實上，伊斯蘭世界往往在同一個時期裡並存著好幾個朝代，各自發展出地方特色，並且相互交流、融合，所以無法以單一的朝代順序去建構文明發展的歷史。

就文化史的發展內涵而言，哈濟生視中土伊斯蘭的知性傳統有三個主要的根源與基礎，即先知傳統的一神信仰、希臘的自然科學與哲學，以及波斯帝國的體制。伊斯蘭建立後，整合了此三項根源，並將

14 順尼派或什葉派，究竟誰是伊斯蘭的正統？這是頗為複雜的爭論。今日，順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與什葉派的伊朗皆各自宣稱是正統。順尼派、什葉派的產生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從伊斯蘭的歷史觀之，西元十六世紀以前，順尼伊斯蘭與什葉伊斯蘭的界線相當模糊，尤其在蘇非主義「神智學」的詮釋上。今日，也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利益的競爭，導致順尼、什葉穆斯林之間的對立。回歸伊斯蘭的根源，原教旨主義者主張「伊斯蘭的單一、全然性」應可解決宗教派別的紛爭，而從伊斯蘭文明的發展觀察，教派的成立只是一種「伊斯蘭多元性」的現象。

它們伊斯蘭化，形成所謂的「伊斯蘭文化」（*Islamicate culture*）。伊斯蘭文化中最重要的內涵即是宗教知識體系（*Nizâm al-‘Ulûm*）的發展，如古蘭經詮釋學、聖訓批評學、伊斯蘭教義學以及伊斯蘭法學等。透過建立這些學科，穆斯林將伊斯蘭之前既存的「波斯伊朗－閃族」（*Irano-Semitic*）一神信仰與傳統賦予新的面貌，建構了所謂的「伊斯蘭律法」（*al-Sharî‘ah*）的傳統與體係，爾後深植於穆斯林社會生活的運作中。而古波斯宮廷的儀禮制度（*Adab*）¹⁵也被轉化至伊斯蘭帝國的政治體制內。至於希臘的自然科學與哲學因素則被導入新的伊斯蘭思想發展中，特別是「理性主義」與「人本主義」對整個伊斯蘭帝國宗教、法律、政治等創制，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哈濟生主張：原則上，不應該分別看待以上提到的三個根源、要素，它們之間實相互結合為一體。這種「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精神、制度（即所謂的伊斯蘭價值觀與傳統），一直持續在發展、相互對話，到了西方科技興起之後才有所轉變。

在政治體制發展上，哈濟生亦透過六個時期清楚地分析其特色與模式：阿拉伯式的統治（Arab rule）、哈里發專制統治（caliphate absolutism）、地方貴族的政制（*A‘yân / Amîr system*）、軍閥政治體制、火藥帝國政治以及現代民族國家。在第一個階段，阿拉伯穆斯林社群（*Jamâ‘ah*）的整體意識為政治體制運作的依據，而在哈里發政權時期，波斯的統治權（君權神授）觀念、制度被吸納取代了社群集體

15 *Adab* 一般解釋為 *manners*，中文勉強可翻譯為「儀禮」。*Adab* 在現代伊斯蘭文化中亦延伸具「文學」（*Adâb*）的意涵。但整體而言，*Adab* 為古波斯政治體制、文化精神的表徵，通常意謂著「生活美學」，是上階層社會人士追求的完美意像。

政治，也實踐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到了第三個層面時，中央集權逐漸轉化為地方政權分治的體制，這也為地方軍閥的興起鋪了路，這時期突厥人（Turks）¹⁶正式進入伊斯蘭中土，取代阿拉伯人、波斯人而成為實質的統治者，也就是所謂的「傭兵」（Mamlûk）政治體制。這些傭兵出身的統治者也與傳統的宗教學者階級相結合，成為政治、社會運作的共生體。宗教學者不僅是伊斯蘭律法的詮釋者，更是經濟活動的要角。此外，宗教學者在此階段亦朝向平民化開展，成為身兼蘇非主義（Sufism）發展的主角，進而建立了不同的道團（Tarîqah），更廣地推動伊斯蘭的信仰。對於中世紀伊斯蘭的傳播、發展，這些蘇非宗教學者功不可沒，而蘇非行者（Sufi）亦被視為伊斯蘭普世化或民間化的推動者。

從十六世紀起，伊斯蘭中土雖然由三分天下的火藥帝國統治，持續推動伊斯蘭文明的發展，但是之前的哈里發政體精神亦依然存在，只不過「蘇丹」（Sultan）、「國王」（Shah）取代了「哈里發」（Khalîfah, caliph）的稱號，在過去輝煌時期的文明遺緒下，伊斯蘭的政治與知識仍然持續深化。即使一些西方研究者主張伊斯蘭文明從十六世紀起就停滯不前，¹⁷哈濟生卻持不同意見。而且事實上，在火藥帝國的統治

16 「突厥」、「土耳其」常被混淆、誤用。Turks 泛指「突厥種族」，而 Turkish 則指現代的「土耳其共和國的人」。因此，對於中亞的五國中的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應稱之為「突厥語系國家」，而非「土耳其國家」（塔吉克屬於波斯語系國家）。所謂的 *Osmâni Türk*，應中譯為「歐斯曼突厥人」，而不是「歐斯曼土耳其人」。Turkish 常被音譯為「土耳其」，是當代的名詞，一般人常常誤用，而籠統地泛指所有的 Turks。

17 「伊斯蘭文明停滯」的主張是相對性的，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後積極發展科技，